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33

悲欢离合的记忆建构——

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研究

白一祎¹

(¹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随着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拓展,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以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 郁达夫》为文本对象, 采用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的形成、发展及在文学领域的应用, 可以有效分析肖水《两日晴, 郁达夫》作品中个体记忆、文化记忆的作用和表现媒介。同时, 在探讨这些媒介及其记忆建构的同时, 应用文化记忆理论作为研究手段, 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 还为理解个体与社会、与空间等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除此之外, 研究还拓展了文化记忆理论的应用范围, 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理论支持, 并为文化记忆的本土化研究与创新提供了实践可能性, 也让我们看到一位当代作家除了美学建构之外的悲欢离合的记忆建构、情感建构。

关键词: 文化记忆理论; 肖水《两日晴, 郁达夫》; 个体记忆; 文化记忆

当代诗人肖水(原名黄潇)于2021年出版的绝句小说诗集《两日晴, 郁达夫》被划分为三个独特的部分: 短篇叙事诗、系列组诗和长篇叙事诗, 各部分都展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并以其独特的文体实验与记忆书写在当代诗坛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两日晴, 郁达夫》一书中, 肖水汲取了中国古代绝句的灵感, 尝试在有限的四行诗中描绘出广阔的生活图景和深邃的精神空间。而在长篇叙事诗部分, 则巧妙地将诗歌的含蓄与精炼与小说的复杂情节和跌宕起伏相结合。肖水以个人的生活体验为基础, 融合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 以及日常生活中情感的波动和诗意的闪现, 更重要的是, 他以精炼的语言和充裕的抒情美学建构了数量庞大的记忆场域, 在这些被肖水建构起来记忆场域中, 人物、事件、情节和环境在历史和社会中经由文学媒介共同构成了一个个充满悲欢离合的记忆, 交际、记忆和媒介三者之间存在着随时间演变的相互关系^[1]得以充分体现。得益于20世纪兴起的文化记忆理论及其相关研究, 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探讨肖水如何通过其作品《两日晴, 郁达夫》在文化记忆的框架内构建记忆, 并以此为契机挖掘文化记忆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从理论层面来看, 肖水将传统绝句的凝练性与现代叙事的开放性结合, 为文化记忆的文学表达提供了新的范式: 既保留诗歌的抒情内核, 又通过叙事拓展记忆的时空维度。从在现实层面来看, 这部作品对记忆的书写直指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 在信息爆炸与记忆碎片化的时代, 个体如何通过文学重构连贯的意义? 《两日晴, 郁达夫》的实践提示了一种可能性——以诗性语言对抗遗忘, 在文本中重建记忆的连续性与情感的真实性的。这种探索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也为理解当代人的精神境遇提供了独特的参照。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切入《两日晴, 郁达夫》的研究, 源于该文本中鲜明的记忆建构特质。文化记忆理论关注集体记忆如何通过媒介被保存、传递与重构, 而《两日晴, 郁达夫》恰恰通过语言与形式的创新, 将个体的生命经验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记忆载体。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人物故事、经历的碎片化再现, 以及现代都市的疏离感描写, 均非单纯的个人回忆, 而是通过文学手法将记忆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

[作者简介]

白一祎(2001-), 男, 云南昆明, 中央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

使读者在阅读中激活对共同生活经验的共鸣。这种记忆的“媒介化”过程，不仅揭示了文学作为记忆载体的功能，也展现了诗歌如何通过美学形式参与文化记忆的再生产。

一、文化记忆理论内涵与历史革沿

20世纪以降的社会研究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被原本属于心理学研究范畴的记忆 (Memorial) 渗透，产生出不同维度的记忆理论研究，并随着研究的转向和进一步发展，逐渐建构起文化记忆理论。

早期对社会心理学维度上的记忆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 (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 的相关研究更贴近真实生活情境下的记忆机制，深入分析了记忆如何在个体中形成、存储和再现，为社会心理维度的文化记忆理论提供记忆的分析基础。而将集体情感上升成为社会情感层面研究的埃米尔·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 则取得了超越了柏格森对记忆的主观化理解，为将记忆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2]25}的成果。作为涂尔干和巴特莱特的传承者的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结合上述二者的相关研究提出了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2]理论，集体记忆理论的出现说明了记忆是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也成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

20世纪后期，西方记忆理论经历了文化学转向，研究重点逐渐从个体记忆扩展到文化记忆，并且研究倾向逐渐转向探讨如何在世代交替和历史变迁中保持文化的相对一致性^{[2]20}，在社会心理学维度的记忆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领域。文化记忆理论不仅关注个体记忆的形成和再现，而且扩展到集体和文化层面，探讨记忆如何在社会和文化中被构建、传承和重塑。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扬·阿斯曼 (Jan Assmann) 以及阿莱达·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对哈布瓦赫的理论进行了深化，将其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个主要内容，从《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记忆和政治身份》、《记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出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与诺拉的记忆场理论具有明显区别。阿斯曼夫妇的理论更强调文化记忆与记忆场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3]的记忆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标志着记忆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私有财产被纳入研究，而是成为了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流动的同时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和赋予新的意义。

二、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研究对象

(一) 文学研究进入文化记忆视域的理论建构

20世纪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所提出的“媒介革命”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社会结构^①。德国学者阿斯特里特·埃尔 (Astrid Erll) 以及她的后续研究者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这也意味着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围需要得到进一步拓宽，文学文本得以进入文化记忆的研究视野，记忆研究之所以能够为文学和电影领域带来新的探索路径，是因为它促使研究者将文本视为记忆的载体，从而为文本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研究视角^[4]，这也与阿斯曼文化记忆的相关阐释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呼应：“黑色墨水笔书写的文字痕迹无疑将是一座更持久的纪念碑”^[5]。因此，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意义，因为文学作品通过直观和生动的表现形式，传达社会价值观、审美倾向，以及那些被遗忘的诸多事物。它们不仅能够解构或重塑现有的文化记忆，还能修正价值观念、历史人物的形象，或是改变社会群体成员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6]。

当然，文学文本进入到文化记忆的研究对象的场域中并非简单的进入，而是涉及记忆与文学这一对复杂关系及其众多相关问题的处理过程。20世纪两次“记忆潮”^[7]的推动之下，记忆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乎一个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文学文本的进入已经在取得了合理性的阐释基础的同时需要更加深入的阐释空间，阿斯特里特·埃尔 (Astrid Erll) 的相关研究回应了文学文本的进入以及这一阐释空间的拓展，并且关注到文学在记忆研究中扮演多重角色，其既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又作为记忆的文学，涉及文学与艺术的互文性和文本间性。同时，文化记忆需要关注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历史化，表现文学中的记忆美学形式，文学作为文化记忆的活跃媒介，影响着集体记忆的构建和传承，要使文学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文学要能够存储信息；其次，文学要能够传播信息；最后，文学要在记忆文化中起到暗示的作用^[1]。当文学作品被用作媒介，并通过文化记忆的处理，甚至融入到文化记忆之中时，它们将以文学的形式呈现某些记忆中的事件^[8]。

(二) 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文学文本书写

结合以上的阐述，可以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将文化记忆的视角纳入文学研究，对于文化记忆边界

的拓展和对基础理论的深入思考具有重要意义。陶东风指出，文学研究与记忆的关系既是理论探讨的路径，也是解释和论述的框架。文化记忆理论重塑了学术研究的视角，深化了对时间与空间中个体和集体关系的理解，并在自我认同受挑战时提供了一种对抗虚无化的途径。文学与文化记忆紧密相连，文学中的记忆书写不仅构建叙事，也反映了作者的生命体验，成为记忆表现的重要领域。随着文化记忆的本土化的进一步推进，研究视野也呈现“一般层面的‘文学记忆’理论却因此多少受到忽视”^[9]的趋势。因此在处理本土化的文化记忆和文学文本的相关研究时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文学中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拓展研究视角的尝试。对文学中记忆的类型、层次和功能进行分析，不仅为文学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也为“记忆表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且贴近的参考^[9]。肖水《两日晴，郁达夫》通过对人物经历、情感体验以及社会环境的细致描绘，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记忆场域。作品中的记忆不仅涉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历程，还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文化记忆理论对《两日晴，郁达夫》中建构起来的记忆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挖掘文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

三、《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个体记忆建构

作为阿斯曼文化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交往记忆 (Communicative Memory) 具有明显的个体记忆 (Individual Memory) 倾向，阿斯曼认为：交往记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它源自于人们的互动，情感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爱情、兴趣、同情、依存感、归属感，以及憎恨、敌视、猜疑、痛苦、罪过和羞耻——所有这些情感都参与了记忆的界定，并为记忆的范围提供了界定^[10]，可见，交往记忆是一种在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记忆形式，它根植于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情感联系之中。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情感共鸣的产物。它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情感，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构建的种种复杂的记忆正是充满悲欢离合的、复杂的。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也有很多有关记忆的表述，他认为，因为记忆本身已经变得稀缺，所以人们频繁地提及记忆^[11]，这表明了记忆在社会发展中脆弱性的一面，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重要性，这些情感共鸣的产物——记忆在社会和个人的互动中被重塑和组合，并被文学文本记录下来，于是，文学文本就提供了一种无形的记忆载体，用于保存和重塑遥远的回忆^[12]。

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伴随肖水的生活体验和观察视角完成了这些个体记忆的建构，从湖南的乡村到山西的大学，再到毕业之后去到上海，这些伴随肖水经历的记忆，无论是自身的体验，还是小说诗中的人物及相关的记忆，都在完成着记忆的储存，以及社会、历史与个体互动的再现。虽然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被界定为绝句小说诗，但侧重点仍在小说，其叙事方式更偏向小说那样的完整叙事，而非单纯的诗歌。雷武铃 (2022) 也认为《两日晴，郁达夫》包含了男女主人公、时空背景、情节、细节等各种叙述要素，事件逻辑清晰明确，语义理解上没有含混的存在^[13]，这种完整的叙事载体也给记忆的储存提供了较为宽阔且具备可延伸的空间场域。同时，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记忆在《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三辑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成为文化记忆理论研究视角下《两日晴，郁达夫》的一个出发点和观察视角。

(一) 山海之间的记忆场域：《两日晴，郁达夫》中的回忆空间

“我在午夜的雪地里，贴着山西大学的围墙转着圈，思考着如何走出去，也同样思考着如何在这四年不误入歧途。我很不快乐。其实对自己的怀疑一直平息不下来。在法学院，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太原，你要以诗人的面目出现，其实极容易变成娱乐事件”^[14]，这是肖水在山西大学就读时的感悟。的确如此，湖南，山西，上海等很多城市、地区将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中大多数的小说诗带入这些记忆发生的场域中。这些地点在这本小说诗集中是有用的，它们承载着大量的个体记忆，在《两日晴，郁达夫》中，肖水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了诸如《上海故事集》、《南岭故事集》、《江东故事集》、《太原故事集》、《渤海故事集》的记忆场域的集合。这些回忆空间和记忆场域中，充斥着大量的他我记忆 (Allocentric Memory)，与之相比的自我记忆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则少了很多，按照阿斯曼提出的自我记忆是基于有意识的重建过程形成的，而他我记忆则是在意识形成之前，由于缺乏组织而无法被系统整理。自我记忆是在与重要事件的互动中逐渐构建的，而他我记忆则是在与特定地点和物品的接触中被激发出来^[15]的阐释路径出发，这一论述较为明确地阐释了他我记忆与回忆空间、记忆场域的关系，不难发现在《两日晴，郁达夫》中，他我记忆的存在将肖水曾经处于的空间以及那个空间所发生的记忆片段编织起来，而且在《两日晴，郁达夫》中的叙事中，叙事的主体主要是“他”或者“她”，很少有内聚焦 (Internal Focalization) 形式的“我”的出现，他我记忆更加强了记忆场域、回忆空间的联系，尽管这些空间并非固定的，但不影响其成为作家通过叙述童年生活、家庭成员、朋友以及周围人物的经历，构建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空间^[12]。这样的空间比比

皆是，成为了悲欢离合的情感寄托，可以是《湘粤古道》中“八岁那年清明，父亲独自回老家扫墓，他扒住车门，大哭不止”^[16]的愁绪，也可以是《骆氏宗祠》中“人们才知她肚子里有了他。彼时武生正空翻，锣声清脆、鼓声咚咚”^[16]的新生喜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古道”、“宗祠”或者很多在《两日晴，郁达夫》里提及的地点或许只是普通的地点，但当这些地点发生的事情被回忆、被文学文本这种媒介所关注到时，这些看似普通的地点就已经成为对事件全过程中的环境细节特征有着深刻的记忆，能够捕捉到瞬间的心理活动，对日常细节表现出异常的心理关注，使人感受到事情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13]的存在，就成为了悲欢离合的记忆场域和回忆空间。

（二）森罗万象的记忆再现：《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人与物

对于一位以记忆为书写目标之一的作家而言，书写记忆的过程中人和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一个作家开始对他人的生活进行介入以谋求记忆的重现时。这些记忆的重现不一定是作家自身的记忆构成，为了再现某种情感表达时，他人的记忆与经历也可以建构成为文学文本，当讨论这些的记忆的属性时，借用保罗·德曼（Paul de Man）“作为内在凝思和经验保存”^[17]的观点，暂且可以将作者对他人记忆重构之后形成的记忆归类为内在化记忆（Erinnerung）。这种记忆理论扩充了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有关个人记忆的阐释，即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记忆对象的称为个人记忆，因为它们确定了个人的过往经历。人们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通过回顾自己的生活史来了解自己过去的事实和身份^[12]。

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人与物也是个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春日即事》、《野风娱人》等这些无名无姓的生命中或亲友或过客的记忆的建构，也有第二辑《故事集》中全是以人名为题的《南溪故事集》。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中对记忆的理解类似，肖水在整篇《南溪故事集》尽力通过生活中鲜活的人们的个体记忆再现，尽可能表达成为个人叙事重要组成的事件，以及这些在个人的历史中具有标志性事件的瞬间。这一点在《南溪故事集》里尤为突出，九个有名有姓的人们，他们的记忆被肖水的文本编织起来，有“栽进了高坡下的稻田”且有着“一堆痴呆儿女”^[16]的《高亮明》，有“丈夫后来成了乡村一生，而她终于将儿女拉扯上大学”^[16]的《李启凤》，这些人们在各自不同的生活和人生境遇中形成各自不同的个体记忆，这些个体记忆同样也是充满悲欢离合的。在《南溪故事集》的标题下有一行解释小字“献给郴县南溪乡”^[16]，这些存在于作者故土中的人与物以及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个体记忆已经成为超越个体记忆而存在的在一种注定的时间中徘徊^[13]的情感载体。

四、《两日晴，郁达夫》：个体记忆到文化记忆

如果抛开肖水对《两日晴，郁达夫》已有的分类，而是将《两日晴，郁达夫》中的《短篇》、《故事集》和《延长》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这个巨大的文本似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台，换句话说，这个巨大的平台就是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场景，肖水期望所实现的“‘从中国回到中国’和‘在本土性之上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性’的反思和延伸”^[18]正是《两日晴，郁达夫》这部作品与社会生活场景紧密相关的原因所在，也是对这部作品进入文化记忆讨论的基础。当充满悲欢离合的个体记忆被建构起来的同时，搭建这些悲欢离合的场景也自然而然地将对这些回忆的处理从个体记忆的研究视角引向文化记忆的研究之下。具体而言，《两日晴，郁达夫》中的叙事场景纷繁复杂，诗中出现了许多地点，包括地名、场所，如佛寺、街道、城市等，涵盖了杭州、武汉、海南、青岛、郴州、南京、北京、太原、三亚等，估计有上百个城市的名字。这些诗歌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涉及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了当代社会的各种场景^[13]，同时，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叙事场景建构之外，更重要的是诗中包含许多现代词汇，但这并不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也不属于现代社会观念下对现实社会（包括个人精神和社会群体）问题的参与式探索，更不是对现实的批判性介入，而是一种美学上的构建^[13]。

当这些当代社会场景成为叙事场景时，文化记忆的书写痕迹也就明显地显现在《两日晴，郁达夫》中，同时，这些无论是时间、事件还是空间等的叙事场景将个体记忆的表现场域进一步拓展和延伸，触及到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文化记忆视角。需要注意的是，《两日晴，郁达夫》文学文本虽然触及到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但讨论的文化记忆范式与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有所不同，对《两日晴，郁达夫》文本的文化记忆处理一定是“区别于不同历史时期官方为维护意识形态话语的需要从上而下建立的回忆政策以及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站在高处审视民间社会的文化立场”^[12]的。就《两日晴，郁达夫》而言，肖水的创作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生活场景，更像是一种“在一个社会中借助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一个大我群体社会经验的总合”^[19]的社会记忆。

（一）《两日晴，郁达夫》中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记忆

当代社会下，电脑和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同时也对传统的书本文化产生了冲击^[20]，在《两日晴，郁达夫》中，互联网记录下的生活记忆在不断重现，有加上微信后男女主人公心中的奔涌或怯懦的记忆，有某位朋友毕业后看到六年前发的想去滑雪的微博，有故人在文昌看到火箭发射时随手的朋友圈定位，有在星巴克里看艺术杂志时看到男人喝剩咖啡的情景，这些瞬间的情景所导致人们产生的情感也是充满悲欢离合的，这些情景瞬间被组成了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记忆，成为文化记忆的一环。去旅行，发朋友圈、微信、微博，去喝咖啡，去搭一辆出租车……这仿佛成了当代社会人们的共有习惯，甚至上升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些是从对过去的回忆和解释中剥离出来的^[20]，当这些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在社会的运作和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被认可时，通过这些方式，社会成员获得了某种认同，于是就形成了凝聚性结构，这种凝聚性结构的意义在于，它让所有成员对这一文化体系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定义了这个集体以及成员作为集体一员的身份，而文化记忆正是这种凝聚性结构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基础^[20]。回溯阿斯曼有关文化记忆的理论时，可以发现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化层叙事的研究倾向：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形式，由于大多数人都拥有并共享着相同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向他们传达和展示了他们的集体，即文化身份^[21]，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记忆是丰富多彩的，通过微信聊天（《自然光线》，2020），旅行（《异星枝萤》，2020）、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二七八米》，2020）等，人们内心深处充满悲欢离合的情感便通过共有的生活记忆在《两日晴，郁达夫》中留下痕迹。

（二）《两日晴，郁达夫》中的文化记忆媒介

《两日晴，郁达夫》中的群体（集体）记忆构成的文化记忆在文本中的留存和传递离不开对文化记忆媒介的再探讨。

首先，《两日晴，郁达夫》中的文化记忆媒介表现为作为“仪式”存在的重要时刻。康纳顿认为，“仪式具有重演特征，通过重复与循环，对于塑造社群记忆具有重要作用”^[22]，当然，为了更加适应当代文化记忆研究，仪式可以被重新解读为更加宽泛节日或者重要时刻，不再仅仅拘束在仪式一词，因为节日等的重要时刻与仪式共享着“通过仪式的演示来使自己的文化记忆不断重现并获得现实意义”^[20]，这也成为《两日晴，郁达夫》中的文化记忆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日晴，郁达夫》中存在大量文化记忆媒介的叙事，“那次，毕业典礼还没开始，人行横道两头，阳光很烈，他眯起眼看了看我身上同样的学士服”^[16]，毕业典礼作为一个重要时刻的仪式，见证人们的相聚又分离，是重要的文化记忆来源。除此之外，还有吊唁的时刻，这同样也是一种重要时刻的仪式：“去殡仪馆前，她找到当年留下的钥匙，打开了他家的门……她想起他的父母，他们正哭着接住每双慰唁的手”^[16]，在这里，肖水并未回避悲伤的仪式的再现，这和毕业典礼、同学聚会、婚礼、大寿等的仪式一样，同样也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这些媒介共同塑造了悲欢离合的记忆。除了重要时刻，节日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仪式：“又返佛殿，火光升腾于香烛之末，我们朝心中一念，一拜，再拜，时近中秋”^[16]^[29]，以及“祠堂里，只有你一个人在写春联”^[16]等。中秋、春节，这些传统习俗与传统节日，是团聚和见面的时刻，人们的记忆在这些特殊的日子得以留存和传达，略显清冷或热闹的节日同样是悲欢离合的文化记忆产生和传递的媒介所在。

“杭州、武汉、海南、青岛、郴州、南京、北京、太原、三亚，估计有上百座城市地名”^[13]，出现在《两日晴，郁达夫》中的城市地点已经被作为个体记忆的回忆空间在上文已有初步的探讨，在进入文化记忆的回忆空间被重新以更加符合文化记忆媒介的研究对象被提出时，需要进一步寻求回忆空间作为群体（集体）记忆的理论适用性。首先是“地铁站”（《山海浪打浪》，2020）、“机场”（《异星枝萤》，2020）这样的地点。作为交通枢纽，车站和机场是人们抵达和出发的常见空间，在《两日晴，郁达夫》中，肖水没有在这些回忆空间中加入准确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当时间因素被剥离之后，空间不再是一个个场景的连续展开，而是以一种同时存在或不受时间限制的自由方式呈现出来^[20]，这也为记忆场所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人们的悲欢离合的记忆都可以在这些空间中被构建，于是，这些记忆空间成为了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此外，就是更加日常的地点：“火锅店”（《二三里》，2020）、“学校”（《浅净深芜》，2020）等勾连起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产生的记忆为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找到身份定位的环境，肖水借助文本的叙事塑形一个个空间，通过这些回忆空间的文化记忆媒介“复活”了记忆，同时，这些空间的变化也引发了更深层的记忆再现和文化反思。因此，这些仪式、重要时刻以及回忆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通过文学文本的再现，使记忆得以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重新诠释和传递。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在文化记忆视角下的研究,可以揭示文化记忆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应用价值。通过上述研究和阐释,可以发现肖水通过《两日晴,郁达夫》的文学文本将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相融合,借助仪式、重要时刻和回忆空间等文化记忆媒介,构建了一个充满悲欢离合的记忆场域。这种记忆的构建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也为文化记忆跨学科研究中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该文学文本研究的意义不仅拓展了文化记忆理论的应用范围,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与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可能性。当然,基于已有的文化记忆研究成果和文本实践,在今后的研究中更深入地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记忆媒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更有意义,以及更进一步探讨这些媒介如何在更广泛的文学文本和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挥作用,以便更深入探讨复杂情感在不同理论话语体系下的文本关照和表现。

注释:

①: 具体参看《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1964)

参考文献:

- [1][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赵莹.霍桑作品中的文化记忆建构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
- [3][德]扬·阿斯曼,金寿福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记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4]Kuhn, Annette. "Memory Texts and Memory Work: Performances of Memory in and with Visual Media"[J]. *Memory Studies*, 2010, vol. 3, no. 4.
- [5][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6]王鑫.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雅科夫的梯子》中的女性形象[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22.
- [7]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M].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08.
- [8]黄雅婷.文学记忆的生成——阿斯曼之后文化记忆理论的叙事结构[D].武汉:武汉大学,2021.
- [9]刘顺.论文学中的记忆[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06),56-62.
- [10][德]扬·阿斯曼著;黄亚平译.宗教与文化记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1][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2]闫琪.文化记忆理论下的迟子建小说研究[D].喀什地区:喀什大学,2023.
- [13]雷武铃.一种抒情美学的重构读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J].上海文化,2022,(03):56-64.
- [14]肖水.某物之来临:我与《西川诗选》[J].名作欣赏,2014,(34):84-87.
- [15][德]阿莱达·阿斯曼著;王扬译,丁佳宁校.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6]肖水.两日晴,郁达夫:绝句小说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17]王广州.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研究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6,(03):52-55.
- [18]肖水,木朵.孤独的,未来的——诗人肖水访谈[J].名作欣赏,2013,(22):132-135.
- [19][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0]王炳钧,王炎,汪民安,等.空间、现代性与文化记忆[J].外国文学,2006,(04):76-87.
- [21]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Knowledge and Space (Klaus Tschira Symposia)*, vol. 4.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 [22][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vicissitudes

——A study of Xiaoshui's poetry collection *two sunny days*, *Yu Daf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Bai Yiy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the study of literary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is gradually unfolding. Taking Xiaoshui's novel poetry collection *two sunny days*, *Yu Dafu* as the text obje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mem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literary field can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role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Xiaoshui's *two sunny days*, *Yu Dafu* works and the performance media. At the same time, while exploring these media and their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as a research means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space.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also expande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provided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iterary research, and provided practical possibilities for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t also let us see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construction of a contemporary writer in addition to aesthetic construction.

Keywords: memory theory; Xiao Shui's *Two Sunny Days*, *Yu Dafu*; individu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